

中國現代作家作品選

中学教师进修教材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

(上册)

上海教育学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炳隅 孙光萱
编者 王自立 赵孝思
陆大铨 陆惠芳

审稿 娄博生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上册）

编者：上海教育学院 出版：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行：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2.25印张 515千字
1979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130,691—154,930

书号：7159·506

出版说明

这套中学语文教师进修教材，是在上海市教育局领导下，为提高中学在职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对语文教育事业的需要而编写的。

我们编写的原则是：既重视学科本身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又密切联系中学语文教学实际并注意讲求实效。教材内容力求达到师范院校中文系的专业要求，并注意做到提示简明及注释详尽，既可作为进修院校教材，又可供教师自学之用。其中与中学语文课本内容直接联系的部分，可作为教学时的参考资料；《附录》中的一些资料，可供有条件的教师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总之，这套教材的编写，既考虑眼前的急需，也适当照顾到今后语文教学的发展与提高的要求。

这套教材共七种，内容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读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逻辑学》、《文学概论》、《中学语文教学法通论》等，除《现代汉语》一书由我院中文系与静安、黄浦两区教师进修学院协作编写外，其余各书均由我院中文系组织专人编写。这套教材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谨此志谢。

上海教育学院

编 者 的 话

一、本书所选篇目系“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时为止的重要的现代作家作品。以散文、小说为主，兼及其它体裁的作品；以短篇为主，中、长篇节选或存目；尽量选用作家的代表作，也顾及历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

二、本书基本上以现代文学史发展线索为序，以作家作品为单元，共选五十多位作家的一百几十篇作品，分上、中、下三册。为便于学员自学，关于作家皆有生平及创作道路简介；关于作品皆有必要的注释和说明；每一单元后还附有若干参考资料。

三、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许多老作家和专业工作者以及中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和支持。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同志亲自为本书题写书名，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许钦文同志热情为本书撰写序言，还有丁景唐同志为本书提供了不少宝贵史料，谨此志谢！

四、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参阅部分兄弟单位有关选本，也参阅了解放后各种中学语文教材。由于水平有限，加上资料不足，仓促定稿，难免存在不少缺点、错误。衷心地希望广大专业工作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九年五月

序

钦 文

这中学语文教师进修丛书之一的《现代作家作品选》，采用着“五四”时期以来五十多位作家的一百多篇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介绍我国重要的现代作家作品的书籍来说，是较为完备的。按照时间的先后，以鲁迅先生、郭老、瞿秋白氏和沈雁老为主的作品结集作上册先出版，以后中、下两册陆续编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谁能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这高度的评价呢？在这五十多位作家中，又有谁能说哪些个是始终和鲁迅先生对立，而不是一道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过来的呢？我觉得这部《现代作家作品选》的出版也就是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四人帮”的黑话。他们胡说什么从《国际歌》以来，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成了空白，要到江青编“样板戏”才填满这个空白点，实在是个荒唐透顶的谬论。

鲁迅先生的作品采用的有二十篇之多，郭老的十三篇，沈雁老的八篇，也不算少。而且另有附录，又各有说明。所

采用的一部分作品并不是语文课本上常见的，也不是为着准备推荐采用作教材；这种作品，虽然不适宜于一般中等学生的学习，在作者却是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时间上的代表性的。对进修学员来说，仍有熟悉的必要。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七)》上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这是为着“从实际出发”，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否则脱离实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就难免滑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去，而且是“很容易”的。因此讲解文艺作品，要先弄清楚“时代背景”，而且不能陷于机械唯物论，象有些人的以为一九二一年党一成立，就全国个个人都马上觉悟起来革命了。事实是在党成立的五年以后，北京还有“死气沉沉”的情形；南方已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北伐，鲁迅先生却是觉得“四面碰壁”以后，算是“逃出北京”的。毛主席号召“读点历史”，提倡调查研究，实在有其深刻的意义。当老师的，总要把教材弄得融会贯通，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如果只靠注释本查考点词、句的解释，没有深切了解教材的实质，“现买现卖”，是难以提高教学质量的。语文老师的进修，当注意增进对于文艺的修养功夫。编辑同志这样编辑，使本书呈现出一个特色，我认为这个特色，也就是一个优点。本书少作机械的注解，却多方供给参考资料，这从不乱加框框的方面说，也应该认作一个优点。

请让我先把我和这部书上册中提到的四位大作家的关系约略地说一下罢：比较起来，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稍微多

一点，从一九二〇年冬开始旁听他讲《中国小说史》的课，直到一九三六年他逝世，十六年间，经常地晤谈和通讯。但多接触不等于了解得深刻。我比鲁迅先生小十六岁，固然，由于年龄和境遇的不同，有些事情，我当时不容易体会到；如今回想起来，也还有不少事情并不了然。我的基础差，气魄小，思想跟他不上，写作的技巧，也只学得点皮毛；我是个劣等生，所以只是比较地接触得多一点。郭老，我和他只晤见过一次，没有通过信。一九三七年秋，达夫从福州回杭州，介绍我到福建师范去教书，我跟着他到上海去乘轮船。他说他这次的返杭，主要为着迎接郭老从日本回国。他同我谈了好些关于郭老的事情，并且约我一道去和郭老谈谈。正当“八·一三”的前夕，轮船提前开航，终于没有能一道去看郭老。我和郭老的一次晤谈，还是由于偶然的会。解放以后他陪着外宾到杭州来参观访问，在飞机场上欢送的时候，我们站着谈了一会。他的耳朵上插着小小的扩音机，重听没有妨碍他的语言交际。他和蔼可亲，留给了我好印象。我最早读郭老的作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文，觉得热情奔放，很受感动。三三年春我到过郭老的家乡，会见过他的一位叔父。我被邀去游峨嵋山，遇雨，停留在二峨山麓金家。一天晚上那里演戏，郭老的叔父和我并坐着观看，谈到了好些郭老在乐山读书时的故事。我在四川近一年，在成都碰到过一个自称“苏里（三苏故里眉山）虚生”的青年，谈起来，是颇以古有苏氏三大文学家，今有郭沫若这样的文豪为四川增光而感到自豪的。积零星的良好印象，想见郭老早年勤学在山水胜地，吸收了“大江东去”雄伟的气势，于他在科

学、文艺的创业中，显得气魄宏大，是不无关系的。可惜我没有同他多接触。

沈雁老，当鲁迅先生初从广州转到上海时期，我与他常常不期而遇。因为鲁迅先生和他都住在景云里，而且寓所很接近。我也曾到他的寓所作过客。在晤见以前，他早使我注意。首先因为他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艺必须为人生，要讨论人生问题。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为我所爱读，好象我也曾在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解放以后，我也常在会场上碰见他。我一向不随便参加团体，一九五六年夏我奉调浙江省文化局已经一年多，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曾到中央文化部去找他，表示由于工作关系，我需要参加作协。会后回到杭州，很快就得到了华东作协的会员证，接着又得到了全国作协的会员证。不久鲁迅先生的遗体从万国公墓迁葬到虹口公园时，他南下来参加典礼。我们一道吃过饭，共同扶过复盖着“民族魂”旗帜的柩车。至于瞿氏，我有否见面谈过话，如今弄不清楚。原因在于他寄寓在鲁迅先生处时白色恐怖严重，在鲁迅先生处碰到的人，无论素识或者初见，话可以随便谈，但决不互通姓名，问住址，以避万一发生意外，有走漏风声的嫌疑。当时并非可靠的人，一般由鲁迅先生约在内山书店会见，既已深入他的住所，总是托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在那一段时间，我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照例先到其三弟处一转，探明他在哪里，怎样按电铃开门，通讯也是其三弟转交。象柔石烈士，我曾在鲁迅先生处多次和他晤谈，可是要到他就义以后，在报章上看到了他的照相，才明白他就是柔石烈士。瞿氏的照相，我在

报刊上所见到，是个小白脸的样子。但后来却有人回忆说他又高又大。我在鲁迅先生处也见到过高大的人，可是确不定究竟会见过瞿氏没有。但我明了：上述四位大作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先生曾把这词句写在立轴上送给瞿氏，可见知己之感。他们连发表文章，也署过同一笔名。一九三三年，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之流献媚反动派助纣为虐时，即由瞿氏拟初稿，共同商量后由鲁迅先生参加了意见加以修改，发表后又由鲁迅先生亲手编入自己的文集。这样的文章就有十多篇。这就并不是只有泛泛之交者之间所能做到的。象《王道诗话》中的“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显然是鲁迅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曾常常谈到这意思。在杂文中，鲁迅先生多引用本国古书上的话，瞿氏却是常用外国书上的话，这是他俩不同的地方；但不尽然，象“为感君恩奏圣明”曾套用《长恨歌》中的“为感君王辗转思”的词句。因瞿氏对本国古书也读得不少，所以难以认定这是由谁先提出的。瞿氏为《鲁迅杂感选集》做了序言。《鲁迅书信集》1208《致曹靖华》：“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原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和作序言，全出于瞿氏之手。我认为鲁迅先生让他这样做，固然由于同情他的处境而救其穷，更其因为高度地信任他，知道他胜任于这工作，不至于只是为着弄点钱而胡乱搞一通的。瞿氏也的确认真负责，仔细选择而多方分析，作出了出色的序言，为鲁迅先生所满意和广大读者所赞扬。《鲁迅杂感选集》的印行，使他俩的知

已感更增进了。瞿氏牺牲后，鲁迅积极出版《海上述林》纪念他。《书信》1208即提到：“它兄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刚付印，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发表过的，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书信》1282《致曹白》：“《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喜欢的书，而无钱买，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时常有此苦，虽然那时的书，每部也不过四五百文。你的朋友既爱此书，可说是《述林》的知己，还是送他罢，仍附上一条，乞便中往一取。”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夜写的，距鲁迅先生逝世只有四天了。他是十九日一早就逝世的，实在只有三天了，还是这样关心对于《述林》是知己的读者、曹白的那个朋友。同一晚上《书信》1283《致台静农》：“今年由数人集资印亡友遗著，以为纪念，已成上卷，日内当托书店寄上，至希察收，其下卷已校毕，年内当可装成耳。”接连写的两封信，同样强调“纪念”的意义。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已在逐渐衰弱，凡事在决定该做的以后，总就说：“那末要赶快做！”在这封信上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形。过了两天，《书信》1284《致曹靖华》：“它兄译作，下卷亦已校完，准备付印，此卷皆曾经印过的作品，为诗，戏曲，小说等，预计本年必可印成，作一结束。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拟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而删去上卷字样；因为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这样，或者就以上卷算是《述林》全部，而事实，也惟上卷较为重要，下卷就较‘杂’

了。”鲁迅先生曾经为着家中有人在西山养病等钱用，而以五百元卖掉一册《小说译丛》的版权，叹着气对我说，“卖掉了版权的稿子，不能再随时修正了！”瞿氏译作的版权也卖掉了一部分。可见当时经济的困难，革命者生活的艰苦了！这已是逝世的前夕，鲁迅先生对于瞿氏的遗作，还是计划得这样仔细，又交代得这样周到：既要郑重地印纪念本，又要扩大其宣传革命思想的影响，尽可能地出普及本。这已是一般友好通讯的绝笔，以后只有紧急托内山完造代找医师的便条了！

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表明态度：“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且介亭杂文末编》）这里的“作家”，意味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作家；在国际主义的前提下，爱国主义并不与之相矛盾。正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当时，鲁迅先生这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又说，“这口号（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信上鲁迅先生特别指出郭老和沈雁老，没有提到瞿氏，因为他已于距此两年前就义了。由

此可见，这四位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早产生——实在也是创造新文化运动，推动这个运动的大作家，是紧紧地联合在一起的。他们能够这样联合起来，决不是偶然的，也并非只是由于感情和洽，一般的志趣相投；而是因为目的一致。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先生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所讲的话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困难当头，这几位大作家奋斗的目标都在于救亡；正当抗日战争前夕，一致坚决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我国。自然，我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向互相友好的。一九一五年，日本军阀利用卖国贼袁世凯的迷于皇帝梦，向我国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袁贼于五月九日承认这无理条约以后，我国人民以“五九”为国耻纪念日；日本的人民，象武者小路实笃等，也就以“五九”为可耻的纪念日，认为日本的军阀无理压迫了我国的人民。鲁迅先生有不少日本朋友，许多鲁迅先生的诗词即由书赠他们而保存下来了。也有因给他们书信很多而印成了集子的，象增田涉的《鲁迅书简》。他们是进步的人士。象《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军阀杀害以后，鲁迅先生还捐款恤其家属。上海沦陷以后，日本军阀的侵略军从鲁迅先生家搜查去了日本朋友的名单，强迫景宋说出他们的住址、通讯处来，甚至于给她上了电刑。她始终拒绝。后来她到日本去访问，受到日本广大人民热烈的欢迎、尊敬，并不是偶然的。藤野先生是早在鲁迅先生初到日本留学时，就表现得非常友好；鲁迅先生一直把他的照相挂在北京的房间里，南下以后还是念念不忘，写下了热情横溢的《藤野先生》。我国明末抗

清志士朱舜水，死在日本，日本人民好好安葬了他，一直保护其坟墓。鲁迅先生在仙台学医时，中途下车去谒其墓。中日人民的确一向是友好的。

沈雁老和鲁迅先生关系的密切，只从两件事情就可以想见：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致电中共中央，“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这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情，是他俩一道署名的。又，鲁迅先生曾经打算应高尔基邀请到苏联去出席会议，是连他三弟都不知道的机密事情，却是和沈雁老商量的了。

郭老对于鲁迅先生也是够尊重的，无论他还避居在日本，和在回到祖国以后，都热情地歌颂：“大哉鲁迅，前无古人！”

鲁迅先生和创造社成员，在笔墨上是经过论战的，和郭老也不无相互讽刺之处；但终于相互了解，认作亲密的战友。达夫是早就接近，长时期地多方和鲁迅先生接触，也是发生了深厚的友谊的。鲁迅先生所厌恶的只是创造社成员中作风不好、态度恶劣的少数几个。论战得激烈的似乎是成仿吾；鲁迅先生在《三闲集·序言》的末了说，“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显得似乎有点气愤。但当成仿吾从河南、湖北回到上海时，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是由鲁迅先生的帮助恢复关系的。既无所谓计仇恨，更没有敌视。当年的论战为着辩明是非，只是论战罢了。对于鲁迅先生和创造社部分成员发生论战的原因之一，我有一种未必确切的看法：无非由于一时见解的不同。鲁迅先生和创造社部分成员，

虽然都在日本留过学，可是时间不同。郭老在创造社的成员中，大概是居大哥的地位的，尚且要比鲁迅先生小十一岁。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文艺界还通行批判现实主义（当时我国是多叫做“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到了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去留学时，由于时代的进展，日本已经通行“新浪漫主义”，是要注重“表现”的了，以为还是讲究“再现”的“自然主义”的《呐喊》，只配上茅房时当作手纸用；没有顾到鲁迅先生写《呐喊》，原是“听将令”，“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固然并不消极，也非真象自然主义的依样画葫芦的。而且写《药》里的夏瑜，关在牢监里将要被杀害了，还是尽力宣传革命：“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也是突破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他们更不了解鲁迅先生的写《呐喊》，是在一九〇七年写了《摩罗诗力说》等四篇篇幅较大文章后，停笔十一年之久再写的。鲁迅先生当时受了伟大十月革命影响，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变以前以介绍外国科学知识和爱国诗人为主，进行示范的正面教育，而为揭穿孔孟之道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暴露几千年人吃人旧社会的黑暗！因为鲁迅先生已经感悟到了“不破不立”的原则：“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物得以诞生的机运。”（《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这一点切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是重要的，所以成仿吾一说《呐喊》中只有《不周山》还好，再版时鲁迅先生反而把这一篇抽掉，并非由于意气用事。毛主席

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的纪念会上，说他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是了解到了这一点的。鲁迅先生在《三闲集·序言》的最后一段上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从表面上看，“塞翁失马”似的，好象多少含点反说的意思，我却认为多半是出于真心实意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上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和以前沉默十一年之久是分不开的。创造社促使他奋斗，认真地精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光荣地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结果实在是好的。

《呐喊》的被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说这种“自然主义”的作法，只讲病状，不开药方，对于病人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似乎先把鲁迅先生抬高当作能治百病的神医华陀看待，再以不负责任的罪名加以攻击。但鲁迅先生并不以万能的导师自居，更不自认是什么神医。他做小说的目的，只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为着“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自选集〉·自序》。）“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任何启蒙运动，做唤起民众的工作，都是要靠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来搞

的。

有些人对于《呐喊》等，只着眼于“人道主义”这一点，以“人道主义不彻底”为理由，贬低《呐喊》等杰作的意义而攻击鲁迅先生。如今苏联也还在玩弄这个把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记得鲁迅先生到了上海住下以后不多久，在一个傍晚，我和他接洽好了些事情，准备告辞下楼了，我是故意想避开在那里吃饭，免得影响他们的生活。可是鲁迅先生一手拦住了我说，“再谈几句去，我还有些话想同你谈谈——他们说我不人道主义不彻底；苏联已经反对人道主义，在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了，‘契卡’（肃反机关），要杀反革命分子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酷；’斯大林这话完全正确，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国内，军阀正在屠杀青年，屠杀进步人士，如果不用人道主义，可以用什么话去谴责他们呢！如果也就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那末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屠杀了。反动派坚持反革命的立场，却是妄自尊作革命者的。所以，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总要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要从实际出发才对的。”其实鲁迅先生，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无形地主张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只要细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可以了然。“打落水狗”精神不就是要彻底革命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么？而且根据可靠的事实做例子说明，辛亥革命时绍兴都督王金发，已经抓住了谋害其同志秋瑾烈士的凶手，原想杀死他而为她报仇的，因为感于“咸与维新”，不打落水狗，释放了那凶手，终于王金发自己也被这条恶狗咬死了。

毛主席号召大家读点鲁迅。在这本《现代作家作品选》